

中国文化与生育率下降

邬沧萍 贾 珊

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欧洲人口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证明了现代人口学的先驱者 Laundry, Becker和Notestein 在20世纪提出人口转变的假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但欧洲人口生育率转变始于何时?并如何在欧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制约这种转变和传播的因素与机制是什么?经济学家诺特斯坦(Notestein)集人口转变论的大成,在30年代从欧洲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出现论述生育率转变的必然性,但很多问题还是不很清楚。为了查明欧洲各国各地区生育率转变的过程和出现这一过程的各种机制,欧美人口学家合作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欧洲生育率调查。国际人口学会前主席寇尔(A·Coale)在70年代总结这项研究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人口转变的再思考》。论文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文化因素对生育率下降有重要影响,作为补充他的老师 Notestein 的论题。在论文中寇尔还提出中国文化圈的国家生育率有先下降的迹象。在当时这还只是一个苗头,但今天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是中国文化同生育率下降有某种(哪怕是很少一点)内在的联系?我们国内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倾向于多育的,这与前面的命题相悖。本文正是为了对中国文化与生育率有无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等做一些探讨。

一、中国文化圈与第三世界非 中国文化圈生育率的比较

中国在汉、唐和明代都采取开放政策,将中国文化同邻近国家文化开展交流,清代以后又有不少华人移居海外,把中国文化传播和扩大。因此邻近一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影响,吸收了中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邻近的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主要是中国文化。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本世纪中以后生育率下降较快,远远快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50年代初,中国文化圈和非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生育都是相似的,总和生育率在6左右。如中国1950~195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6.24、新加坡为6.41、南朝鲜为5.8、泰国为6.62。台湾1950年出生率为43.29‰,比中国大陆当时出生水平还高出13.29个千分点。至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南亚、西亚、中美、南美等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6.11、6.78、6.70和5.68,非洲为6.61。中国文化圈国家在1950~1960年生育率还处于高水平,同非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差别并不显著。

(二)50年代以后,部分中国文化圈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开始较早且下降速度快。下降最早的是日本,1935年降到2.37,1960年又降到2。不久新加坡于1960~1965年总和生育率从6左右下降到4.93,到以后5年又降到3.46。其次是香港、南朝鲜和台湾,1965~

表1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比较

	1950~ 1955	1955~ 1960	1960~ 1965	1965~ 1970	1970~ 1975	1975~ 1980	1980~ 1985	1985~ 1990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中 国	6.24	5.40	5.93	5.99	4.76	2.90	2.36	2.49	1.96	1.80	1.80
香 港	4.43	4.70	5.30	4.01	2.89	2.31	1.80	1.70	1.80	1.80	1.80
新 加 坡	6.41	6.00	4.93	3.46	2.63	1.87	1.69	1.65	1.80	1.80	1.80
南 朝 鲜	5.18	6.07	5.40	4.52	4.11	2.80	2.40	2.00	1.80	1.80	1.80
马 来 西 亚	6.83	6.72	5.94	5.15	4.16	3.91	3.50	2.27	2.08	2.08	2.08
菲 律 宾	7.29	7.09	6.61	6.04	5.29	4.96	4.14	4.33	3.09	2.47	2.08
泰 国	6.62	6.42	6.42	6.14	5.01	4.27	3.52	2.60	2.07	2.07	2.07
印度尼西亚	5.49	5.67	5.42	5.87	5.10	4.08	4.10	3.30	2.20	2.07	2.07
南 亚	6.11	6.09	6.03	5.96	5.76	5.27	5.14	4.72	3.59	2.65	2.16
西 亚	6.18	6.63	6.48	6.25	5.90	5.48	5.20	4.92	4.09	3.40	2.73
中 美 洲	6.76	6.79	6.79	6.68	6.33	5.11	4.47	3.91	2.88	2.60	2.45
南 美 洲	5.68	5.73	5.75	5.17	4.62	4.22	3.89	3.58	2.85	2.57	2.38
非 洲	6.61	6.69	6.74	6.71	6.60	6.52	6.37	6.23	5.25	4.18	3.05

资料来源：1989年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

197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5以下,1970年台湾出生率下降到25%以下^①。中国大陆1970~1975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5以下,邻近中国兼容有一些中国文化影响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生育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这些国家生育率下降速度也是很快的,1975~1980年总和生育率基本上都下降到3以下,香港和新加坡下降得更快一些。

相比之下,非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的幅度较大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仍维持在5的水平上。

(三)从当前生育水平的比较看,中国文化圈国家的生育率经过一段时间的较快下降后,目前生育水平已经达到较低的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1985~1990年总和生育率最低的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分别为1.7、1.65、1.7和2,均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生育率的水平。中国80年代总和生育率约为2.5,虽然高于上述地区,但中国的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上述地区,在8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达到

1.7以下,上海低于1.5。

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的生育率略高一些,在3左右,但相比于亚、非、拉等非中国文化圈国家的生育率要低得多。这些地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大都在4左右,非洲在6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从现在到2000年后,中国文化圈的国家 and 地区生育率仍将继续下降,直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的生育率在2000年以后将低于更替水平。那些兼容中国文化的邻近国家预计2000年以后生育率下降会快些,总和生育率接近于或略高于更替水平。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来生育率也将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速度不快,200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在3左右。

二、中国生育水平的地区比较

(一)相邻近地区生育水平相近。寇尔(A·Coale)在他著名的《人口转变再思考》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在研究了欧洲各国生育率变化以后发现,有一些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先后的地区分布与不同语言

^① 根据李国鼎著《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论》,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出版,第62页。

分布的地区不谋而合。由此他得出一个很有新意的结论,生育率的转变不完全受经济的左右,文化对生育率的转变起很大的作用。这在中国也可以观察到,相邻近的地区由于文化接近,生育行为互相渗透,生育率的趋势也常常近似。

中国生育率的变化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与文化的相近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1989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国生育率可以明显分为以下几类地区:

1、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这类地区的特点是生育率低,8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

2、中原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其特点是生育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80年代中平均生育水平为2.39。

3、山区和高原地区:包括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贵州等,特点是生育水平在全国最高,80年代总和生育率在3~5之间。

沿海地区是中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这些地区观念更新快,人口的文化教育素质高于内地,文化交融多,易于接纳新的生活方式。生育观念与时代潮流相匹配,并不固守旧的生育方式。表现在生育行为上,更倾向于少生育。相比之下,内地和较偏远的地区传统文化和观念在头脑中积淀深厚,接受新思想慢,因而生育观转变也慢。生育行为更保守,生育率较高。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差异。中国汉文化对于汉族人口的生育率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汉文化未能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处于中国主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其独立性,表现在生育率上也是如此,汉族生育率一般都低于少数民族。广西、宁夏、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省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

居地,这几个省的生育率也是中国最高的,总和生育率在3~5之间。再例如,青海省1982年汉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2.95,少数民族为5.69;贵州省1982年汉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4.4,少数民族为5.2;广西壮族自治区1984年汉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3.34,少数民族为4.14;云南省1984年汉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3.8,少数民族为4.7。从各少数民族1981和1986年的总和生育率看,除朝鲜族总和生育率低于汉族外,其余的少数民族生育率都高于汉族。其中,尤以藏族、维吾尔族、布依族、哈尼族的生育率最高,在3~5之间。这些说明中国国内汉族文化与非汉族文化人群生育水平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东亚地区的海外华人的生育率也低于当地人,从中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据1989年12月11日香港《东方日报》报导,马来西亚华裔人士一向自行节育,造成华裔人口出生率下降很快。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当局的注意,政府要加紧对华人进行宣传教育,让他们多生育孩子。政府宣布,希望华人每对夫妇能生3~5个孩子,协助马来西亚人口适度增加,对未来经济发展尽力。另外,占新加坡总人口70%的华人在该国生育率的下降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华人的生育率明显低于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的生育率水平。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文化与生育率是有关的,中国文化圈国家的生育率有率先下降且趋向低生育的特征。这其中必有一些内在的动力,文化因素对中国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下降所起的作用不能漠视。

三、中国文化对生育率影响的初步解释

(一)中国文化的涵义。中国文化是在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吸收有益的养料,不断扬弃糟粕,保存和发展优秀的传统积淀起来的,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社会意识、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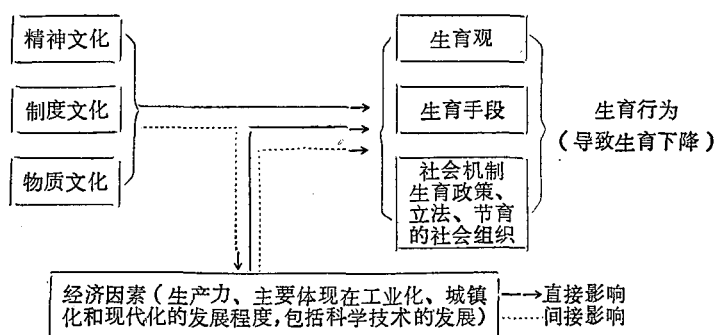
心理直到科学理论、文学、艺术、法律等等。但是，这些文化至今仍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有益的文化中发展。中国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半个世纪来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吸收改革开放后的新文化形成的。因此把中国文化伦理解释为是传统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就看成中国文化是不全面的。当然儒家的文化在中国经过历代帝王的拥戴和儒家文化不断地吸收其它文化而有所发展变化，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毕竟不是全部。因为中国除了儒家外还有诸子百家，其后又不断吸收佛教、道教文化而发展。中国的文化有主文化也有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除了汉族文化外，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也还有大众文化等等。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本文所谈中国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就主文化和汉族文化而言。

中国文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从来都是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其中影响的程度又各不相同。因此，分析中国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能笼而统之，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二) 中国文化对生育率影响的理论模式。人口的生育率能否迅速下降，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条件：(1) 育龄人群有无限制自己生育的愿望和要求；(2) 社会各种机制是否有利于生育率下降；(3) 需要限制生育时，能否取得节育的各种手段。这几个条件能否出现，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因为低生育率是适应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生育模式。生

产的发展一般都能使生育率下降的三个前提条件呈现。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对低生育率也有一定影响，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加速或延缓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因为一定的文化对降低生育率的三个条件有着不同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有的是直接对生育观、对社会机制发生作用，但更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通过对经济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而后再作用于生育观、节育技术和社会机制。中国文化对生育率影响模式可以概括如下：



四、中国文化哪些遗产能对生育率直接或间接起作用

不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孔孟之道，特别以“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论据而得出中国文化只能促进高生育，这就对当前中国文化圈的生育率在第三世界率先下降似乎不好理解。其原因首先是没有抓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以偏概全。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没有把经济作为决定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能对经济基础起促进作用，因而也就间接促进了生育率下降。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进步的思想也能对生育下降有所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对生育率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精华部分大致如下：

(一)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群体意识，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合一和协调突出群体意识、歌颂忘却自我。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封建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把国家和社会强调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达到为掩盖一姓王朝谋利益的目的，但经年日久就形成一种整体精神。儒家用“仁”和“利”来强调群体利益。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公私矛盾时歌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集体、群体的意识在客观上造成中华民族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传统，希望国家繁荣富强。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强调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对地少人多长期受中国文化圈影响的日本、新加坡、南朝鲜以及中国的港、澳、台肯定的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也需要生育的现代化。因此，不能认为低生育率的愿望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悖。

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新文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无疑是加强了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在中国70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中，长期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使人们从国家民族繁荣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中华民族广大群众从来就有着一一种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教育下一代克勤克俭，这点同士大夫鄙视劳动截然相反。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摆脱农业自然经济影响后，成为发展现代经济的一种动力和优势。他们战后经济突飞猛进，超越许多发展中国家，同这种精神文化条件不无联系。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前提。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教育、重视道德修养，这些无论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降低生育率都有很大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特别其中“古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使中国被称

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受这一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教育，使教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前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在中国的思想家来看，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是人们应该追求的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就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格言，这是适应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给人一种严于律己以适应社会、国家目标的教诲。把它批判地吸收到现代社会有利于个人控制生育，重视教育和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融合中，为开展人口教育的宣传并取得较好的效果是可以理解的。

（四）中国传统的重人轻天的无神论一直占主要地位。这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狂热迥然不同。由于中国强调中央集权，把天子凌驾于宗教之上，另一方面，对于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能理性对待，并把它融到儒家文化中，形成所谓儒释道融合，而不是对立起来。因此中国政教一直分离，没有出现全民族的宗教狂热。因而反对节育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影响，对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未能起到主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下降没有受到宗教的很大阻力，生育率比邻近国家，特别是宗教强烈的国家都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文化对生育下降所起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文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生育转变的作用是间接的。但生育水平的变化是包括经济、文化、历史、习俗等在内的多种因素相互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广义讲，这些因素多数属于文化范畴。科学的作用就是要认清这些因素的作用，促使生育率向优化的方向发展。

五、中国文化中有阻碍生育率

转变的因素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已达到或低于生育率的更替水平。目前中国大陆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5左右(其中城镇约为1.4,农村约为2.8),相当于欧洲国家50年代的水平,在人类生育率转变史上已属于低生育。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低于中国的几乎都是亚非拉的岛国或半岛国家,而那些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比重都很高,有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城市国家。中国大陆要求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在农村地区,会遇到低生产力水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挠。因此,需要逐步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批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的糟粕。

由于从汉代起“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的是非为价值观标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影响就特别深远。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很多是同儒家的思想有关,儒家思想中确实不利于现代化的成份。诸如,鼓吹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观念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维护封建统治的专制主义,家长统治和“三纲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鄙视科学技术,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等等,这既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现代化,也不利于生育率转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吸收过苏联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做法。诸如,“人口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和环境

(上接第45页)

(五)从1985年开始初婚年龄逐渐增加。与1984年相比,主要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造成的。如果考察年龄别初婚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则1985、1986、198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要比1984年低0.03岁、0.12岁与0.11岁,这说明1984年后早婚及刚达到法定最低婚龄就结婚的人占该年初婚人数的比例逐年增大。同时由于早婚人数的增多又促使1984年后早育现象日趋严重,导致女性初育年龄的继续下降。(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问题等等,都妨碍了生育率的转变。因此批判这类中国文化的糟粕才有利于加速生育率的转变。中国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精华但也有糟粕。近半个多世纪的吸收、积累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益的,但也有的是教条主义的不利于中国生产力发展。近年在吸取现代西方的文化时,应择其善而行之,绝不能“全盘西化”。因此对待中国文化有处理古与今、中和外的问题,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的标准就是能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富裕、文明、繁荣的新中国有用、有价值的文化。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也是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今后随着经济发展会自然地继续这一过程,最终实现人口稳定化。至于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导致人口锐减,人口急剧老龄化也不是中国文化所向往的。

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利用积累起来的中国文化财富加速生育率转变的进程,批判阻碍发展的因素。例如可以在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工作中,利用传统的乡规民约和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主的计划生育协会开展工作,可以理直气壮地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来说明计划生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推动工作的开展。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双层经营以及科学兴农,计划生育科学技术进步等将为生育率转变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条件。使中国文化中有利的因素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本文责任编辑:张京华)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